

三月二十九日 紀念 叢刊 三月二十九日

革命先烈紀念日

本社編

12



民團週刊出版社

丙種叢刊第七種
紀念叢刊第一輯之三
革命先烈紀念日
本社編

必翻印

每冊實價國幣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發行者 社長 副社長 總幹事 編輯主任 發行主任 總經理

民團週刊社 馮璜 林中奇 錢實甫 亢真化 蔣卉 民團週刊社

社址廣東省城西寧鄉塘廣西民團幹部學校
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廿六日初版二千冊

出版總字第五二號

革命先烈紀念日

(又名黃花節) 紀念叢刊第一輯之三

——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國

目

次

1. 三·二九的事略
2. 三·二九革命的意義與價值
3. 紀念日的儀式

一三·二九的事略

民國前一年的三月二十九日，七十二烈士在廣州起義，~~不幸失敗殉國~~他們的碧血忠魂，埋葬在廣州近郊的黃花崗（原名紅花崗）；後人爲追懷先烈的悲壯犧牲，特定這一天爲「黃花節」，留作永久的紀念。

事實的發生，是在民國紀元前一年，即清宣統三年辛亥，公元一九一一年。它是武漢起義之前的第十次革命，也就是民國成立以前的革命運動最後一次的失敗。

第九次革命（宣統二年庚戌廣州新軍之役）失敗以後，革命同盟會在華南方面經營了一年多的基礎，幾乎全部破壞。因此，革命黨人多數都不禁氣短。當時總理止在由美洲東行，到三藩市便得知失敗的消息，因取道檀香山、日本去檳榔嶼，電邀胡漢民、黃興、趙聲諸先生往商捲土重來的計劃。據總理在自傳中說：那時各同志都非常焦慮，提到將來的辦法，便祇有歎息。經總理再三的慰勉，並向當地華僑籌款備用，才決定再發動第十次的革命。這一次的革命雖又失敗，却已奠定了成功的基礎。

至於具體的辦法，還是以新軍做主力。但發難的責任，却由同志擔任，做

一切軍隊和民軍的嚮導，並預定廣州勝利後，即由黃興先生統一軍出湖南，攻湖北；另由趙聲先生統一軍出江西，攻南京。總理說，這一次的辦法，「將傾全黨人力財力以赴之」。可見黃花崗之役，已經是革命黨從艱難困苦已達極點中振拔起來，和滿清鬭爭的最後一次。它不幸仍歸失敗，但它的影响所及，更加振發人心，不到半年，即有武漢光復的最後成功。

這個辦法，是庚戌年十一月在檳榔嶼決定的。十二月初，趙聲先生即回香港保存廣州的新軍團體。黃興先生接着也到香港，辛亥正月間，胡漢民先生和長江各省閩桂日本各處同志，又先後到港，便在香港組織「統籌部」，分配工作。統籌部的人選如下：

正部長 黃興

副部長 趙聲

出納課 李海雲 掌財政出納

秘書課 胡漢民 掌文件

儲備課 胡毅 掌購運軍械

調度課 姚雨平 掌運動新舊軍人

交通課 趙聲 掌長江華南各地交通事務

編制課 陳炯明 掌草定規制

調查課 羅熾揚 掌伺察政情

總務課 洪承點 掌一切雜務

這個新的組織比較過去，自然是要嚴密得多。以前累次的失敗，大都因爲一機關一部分的被破，即牽連全局。因之，此次爲慎重計，乃議決各事務分別由主任人員掌理，互不相通也不相告，藉以保守秘密。另在廣州設立的機關，

如仙湖街治平書院的總部，和小東營、蓮塘街一帶的分部三十幾處，起初也是各不相知。不久，長江各省的祕密約信，已有相當的成熟，廣州方面的新軍、防營、警察、民軍和本黨的選鋒隊，也都有了相當的準備。發動的時間則定於三月十五日，各路同時起事。選鋒隊定爲八百人，均由同志擔任，分十路。黃興先生率領百人攻督署；趙聲先生率領百人攻水師行台；徐維揚率百人攻督練公所；陳炯明率百人防截旗界，占領歸德、大北兩城；黃俠毅率百人攻警署、協署，兼守大南門；姚雨平率百人占領飛來廟，攻小北門，接引新軍入城。以外還有五十人一隊的四隊，分攻他所。至於軍械的輸運，也規定：日本買來的由黎仲實負責，安南買來的由呂俠、黃煥負責，暹羅買來的由胡毅生負責，香港買來的由陳子岳、李紹堂負責，分別密帶廣州。其它種種的預備工作，也在祕密中積極的進行，祇等到時即起了。

不幸三月十日，忽然發生溫生才先烈刺殺滿人爭琦的事，城中特別戒嚴；一面調防營布防，一面下令搜索。再各地密運的軍械，遲至二十日還未到齊。加以在南洋一帶籌款時，已被立憲黨偵知究竟，不惜出賣革命團體，通知兩廣總督張鳴岐趁早預防。因此，預定的期間，就不得不遲延。到二十六、七日後，廣州城內即已風聲鶴唳，機關和黨人已有不少被破壞捕獲。情形如是，黨內乃有人提議延期，命各部已到廣州的撰鋒隊一律退出，未到者暫時勿來。黃興先生是二十五日到廣州的，獨他反對延期的辦法。在他的意思，以爲集中人材既已不便，而又將失信於南洋方面的同志，影响尤大。不過大家力主延期，他也祇有順從。

但二十八日却來了一個很好的消息，有人說粵督調來的防營，即是本黨的同志，起義的事大有可爲。於是又變更計劃，定於二十九日午後十二點舉事。

不料到二十九日正午，黃興先生住所附近的機關又有破獲的；大家恐怕受其牽延，搜索本處，都力主即時發動。朱執信先生並堅決的說：假如再不發動，他便自殺。因此，又定於本日午後五時半，由黃興先生率領選鋒隊百人撲攻督署，首先起事。原定的十路分配，經過幾次的變更計劃，祇得四路。其中延接新軍的一路，也受變更計劃的影響，沒把軍械送到，以致新軍祇在城外坐觀成敗，這是最大的一個弱點。

黃興先生起事後，即攻入督署，張鳴岐由署後鑿孔逃往水師行台。這一部分同志既失目標，乃謀分途轉攻他處。走到雙門底時，恰遇着防營軍數百人，立即交戰，雙方都大受損失。其實這部分防營軍隊是由溫帶雄所領導的，他雖隸屬於政府軍方面，却早和革命黨有了很密切的聯絡，并已得革命黨的密令要他於五時半往攻水師行台，擒拿李準。他因為防止洩漏秘密的緣故，嚴守各部

不相聞問的原則，所以沒有通知統籌部。同時他的部隊又全係清軍的符號，更引起誤會。當他出發時，李準要他入城防攻黨人的命令已到，他歡喜已極，一方面將傳令人扣留，一面率隊直赴水師行台，預備在到達時再換革命黨的白布臂章，以免沿途被阻。不料雙門底兩方相遇，相互不知原是同盟，黃部方聲洞即首先向溫帶雄發槍，溫立被殺，而方也戰死。雙方死傷殆盡。其它林時爽在東轅門招撫李準的先鋒隊，被流彈擊死。徐維揚率花縣健兒四十幾人，欲出小北門會合新軍，被阻，死者二十四人，被捕六人，負傷生還者不過十六人。喻紹雲率領七十人進攻督練公所，遇清軍繞道攻龍王廟，初雖小勝，終亦犧牲。出大南門一隊，在雙門底遇清更李聚辰，即擊斃，但爲清軍包圍，全部殉國。此外各軍，多已聞變即起，但均被清軍阻止。

黃興先生在雙門底激戰時，最後祇剩一人，退到一個小店內就門隙外射，

中七八人，其他即不敢前進。脫險時，才知道已斷三指，輾轉逃入河南，數日後變服去港。其他朱執信、何忍夫、熊克武、王以通諸先生，莫不負傷。黨員被犧牲的，約有七十二人，姓名列後。

革命黨失敗以後，張鳴岐即下令兩道：（一）不準外來船隻搭客登岸，（二）凡無辮髮的，無論是否黨人，一律鎗殺。其他被捉的黨人，都能慷慨就義，審訊時多侃侃而談，宣述大義，連滿清的官吏也爲之動容。事後義士潘達微先生遍找各先烈忠骸，陸續搬到諮議局前的空地，要求廣仁義堂給地埋葬，得允許以紅花崗爲先烈的墓地。其時潘先生本不想被人知道，連夜就把安葬的事情辦妥。不料被保皇黨的國事報首先刊載，潘先生乃不得已公布出來。他用標題是：「諮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崗上黨人碑」。因他嫌「紅花」兩字軟弱無力，不如「黃花」的雄渾悲壯，於是「黃花崗」這個名稱，至今便成定名。

當時捕殺黨人最殘刻的，要算是水師提督李準了。六月十九日，他經過雙門底時，即爲黨人林冠慈狙擊，連擲兩彈，李受重傷，林亦爲衛兵亂鎗所殺。同日另時黨人也準備刺殺李準，聞變乃止。可見此時前仆後繼的精神，悲壯熱烈的犧牲，的確是足以感人丁了。

三月二十九日的革命事略卽是如此。它的價值，我們可由總理的遺著，明白它的意義。總理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上面說：「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爲最。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繫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并壽——由這幾句話看來，就可以知道三·二九革命的價值了。」

二二二·二九革命的意義與價值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革命運動，雖然是一幕歷史上的悲劇，但同時也是一個新時代建樹的開端。可以說：中華民國的誕生和中華民族的育長，經過了三二九革命的偉大的壯烈犧牲，才達到飽和的程度。所以我們對於這一次舉義的認識，便不應該以爲祇是一種平凡的失敗，沒有多大的意義和價值。在實際，反而要將它當做一件最有意義和最有意義的成功事件來看。至少，也要將它當做一個到成功之路的必經階段，而且是一個必需的階段。專拿局部的情勢批評，它自然不免略有些失敗的缺陷；但就整個的革命運動來觀察，則它確居於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挽回了過去九次革命的所有損失，促進了武昌起義的最後成功。沒有它，以往歷次犧牲的損失將會毫無代價的銷乾，繼起的改造工

作也將難以完成。

總理訓示我們說：一個革命黨人應有的態度是「不成功便成仁」。黃花崗殉國的諸先烈，便可說是完全的做到了。成仁是個人必具的犧牲精神，成功是革命必達的最後階段。但沒有成仁的壯烈犧牲於前，便不會有成功的期其實現於后。所以三二九死難的諸先烈，不獨已絕對的成仁，同時也已消極的成功。他們非特毫無意於做一個成仁的徵幸者，更確已堅決的去担当了成功的犧牲者的不幸結果。

凡是一種革命運動的成熟，以前一定要有一個相當時期的孕育階段。在這個孕育的過程之中，必需的條件便是一致的醒覺，而共同亟起奮鬥。要使整個的意識達到一致醒覺的程度，則更須有兩個不可缺少的原動力量：一是犧牲精神的激動，一是奮鬥忠誠的感召。前一種是消極的刺戟，間接的啟示和規範；

後一種是積極的誘導，直接的訓誨和勉勵。兩種力量在孕育的過程中，同樣的不可缺少，亦同樣的重要。在性質上雖能分別出它們的效用的不同，然而本質上則是相互爲用的兩面一體。換句話說，前一種着重於背面的推動，後一種見效於正面的引導。所以成仁與成功，其意義既相同，而價值也是相等的。

總理畢身盡瘁於革命工作的重心，完全是把握着革命實力的健全一點，做種種培植充實的工夫。他一方面不斷的宣傳，使大眾得有深刻的認識，由認識而自覺自奮起來。一方面他又不斷的努力，使大眾得着偉大的模象，由模象而自重自勉於成。直到他離脫人間的最後一瞬，還諄諄的告誡同志說：『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國民革命）目的，必須喚醒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可見革命成功，決不是二二人的努力可以做，一定要大多數民衆澈底的覺悟和奮起，一致動員，才可以把握着最後的勝

利。總理是先知先覺者，是發明家，是整個革命運動中的主腦人物。他所給予一般民衆的感應，是他個人人格精神的偉大，主張學說的崇高；使人心服、景從。黃花崗殉國的諸先烈，則是後知後覺者，是實行家，是整個革命運動中的策進中堅。他們給予一般民衆的刺戟，是其死難精神的可歌可泣，犧牲意志的不屈不撓；使人欽服、力從。他們的生命縱已犧牲，但意志和精誠仍然是永久的留在人間，擊動個個將燃未燃的革命之心，加強憤怒的火焰，促進其爆發。尤其在九次革命的失利之後，若沒有這一次最後的犧牲，一般民衆的自覺心和自信力，便會漸漸的銷滅下去。由於行動的不幸，影响到主張的懷疑，事實形成，鑄就了一個不可挽回的大錯，便很難得再燃了。

黃花崗殉國的諸先烈，對於這兩點都已看清楚了。成功是自然之事，他們願為成功而努力；成仁是當然之事，他們願為成仁而犧牲。整個的成功是基

礙於他們的成仁，促動於局部的犧牲，犧牲雖是一種不得已的損失，却也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傷害。祇要犧牲的意義偉大，則其價值亦同樣的高貴。諸先烈之所以不計一切的勇往直前，便是爲着整個的責任着想，而將本身的得失禍福，却看得非常的渺小，完全將個人的一切融化在社會的福利中了。

我們在今日追懷往事，對於這種犧牲個人而喚醒民衆，促進成功的悲壯史事，實在值得深切的注意。尤其是在國難嚴重的當前，革命的情緒非常澎湃，改造的工作格外難行，三二九革命所遺留給我們的教訓，更值得我們澈底的反省和覺悟，簡單的說：成功是由失敗過渡而來，亦是從犧牲中奮鬥而出的結晶。我們祇要能毅不怕失敗，不計犧牲，則最後的成功必然是可以預期的。這樣的論據，並不是一種武斷或妄想，它早已由三二九革命的實事予以確切的證明了。